

交往、适应与融合

一项关于流动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比较研究

Interaction,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Labourers
and Land-displaced Peasants

童 星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交往、适应与融合

一项关于流动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比较研究

Interaction,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 Labourers
and Land-displaced Peasants

童 星 马西恒 王毅杰 严新明 张海波/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往、适应与融合：一项关于流动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比较研究 / 董星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

ISBN 978 - 7 - 5097 - 1389 - 1

I. ①交… II. ①董… III. ①农民 - 城市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1488 号

交往、适应与融合

——一项关于流动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比较研究

著 者 / 董 星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邓泳红

责任编辑 / 刘德顺

责任校对 / 张立生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 25 版 次 /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473 千字 印 次 /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389 - 1

定 价 / 69.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现有研究文献回顾	1
第二章 流动进城农民与郊区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资本研究	24
第一节 理论背景与研究设计	26
第二节 流动农民社会网络资本	44
第三节 失地农民社会网络资本	57
第四节 流动农民与失地农民两群体的社会网络资本比较	70
第三章 流动进城农民与郊区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研究	86
第一节 研究设计	86
第二节 流动农民的社会适应	110
第三节 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	139
第四节 流动农民与失地农民社会适应的比较及其社会政策框架	168
第四章 流动进城农民与郊区失地农民的城市社区融合研究	18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188
第二节 关于社区和社会网的含义	194
第三节 调查分析之一：南京市流动农民与失地农民的 社会网比较	202
第四节 调查分析之二：上海市新移民与社区的融合和隔膜	208
第五章 流动进城农民与郊区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222
第一节 农民失地引发的问题分析	223
第二节 民工进城引发的问题分析	233

第三节 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政策·····	243
附录·····	279
一 流动农民和失地农民日常生活调查问卷·····	279
二 访谈对象基本资料·····	293
三 个案访谈记录·····	295
参考文献·····	404
后记·····	415

第一章

现有研究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数以亿计的农民流入城市务工、经商、落户,形成一股震撼全社会的“民工潮”^①。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跨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批农用地特别是城郊农用地被政府征用,转为非农用地,又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流动进城农民和郊区失地农民的就业、生活、保障状况如何?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的程度怎样?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成为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经久不息、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理所当然地构成本课题研究的现实基础。

一 关于进城农民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1. 民工潮的历史考察

池子华对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农村人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归根到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首先要让农民回到土地,使“耕者有其田”,这是第一步。中国共产党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52年终于基本实现这一目标。但让农民回到土地上,只能是一种过渡形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才是最终目的,这是第二步。农业从业者在产业就业总人数中的比率不断下降

^① 早在建立计划经济框架年代的1953年,国务院就曾发出“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并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农村人口外流到城市和工矿区,所以媒体和社会各界一直将非政府计划安排而进城的农民称为“盲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盲流”这一带有歧视性的词语才被停止使用,被“农民工”或“民工”的概念所取代。

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中国要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目标,也不能例外。如果说让农民回到土地上是一场伟大革命的话,那么,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样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第二大步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启动,其标志就是“民工潮”的泛起。

“民工潮”的重新涌起,并非历史的延续,但也并非与历史绝无联系。农村经济的衰退可以引发“民工潮”,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可以引发“民工潮”。20世纪80年代“民工潮”的泛起,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这与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涌起的“民工潮”,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近代中国并没有完成社会转型,农业走出传统、农村工业化之梦、城市工商业充分发展的理想,理所当然地要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来实现。^①

为了解释“民工潮”这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形式,宋林飞曾提出12个命题:(1)“民工潮”的源泉是农业剩余劳动力;(2)“民工潮”的动因是比较利益;(3)“民工潮”形成的主要方式是连锁迁移;(4)农业剩余劳动力首先选择了离土不离乡的低成本转移渠道;(5)跨社区流动需要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6)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形成梯度转移模式;(7)“民工潮”源头的体制性失控正在加剧;(8)农村第二步改革旨在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9)“民工潮”源头降压的主要途径是乡村工业化;(10)“民工潮”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风险近中期均有上升趋势;(11)乡村城镇化为“民工潮”构筑第一级“蓄水池”;(12)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城市化。^②

2. 农民工的就业与生活状况研究

关信平等人的调查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外来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与生活的基本情况。归纳起来看,外来劳动者大多数在城里都能够获得一定的就业和收入,并且与农村相比其收入和生活状况还比较好。他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首先,他们中有许多人还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主要是由于城市中的各种消费导致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成本很高。其次,外来劳动者在医疗和子女教育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再次,外来劳动者在城里是弱势群体,缺乏相应的组织和社会资源的支持体系,因此其基本权利往往更容易受到侵害。最

① 池子华:《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宋林飞:《“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后,外来劳动者在城里与本地人的交流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常常感受到一定的歧视。^①李培林从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流动民工的生活状况、流动民工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使读者在把握民工的一般“自然”状况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内心世界”。^②他的研究对于从事社会流动研究的同行来说亦不乏借鉴与启示之功用。

王奋宇等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于个人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作用,也同样证明了社会资本在民工经济地位获得中的意义,这种作用已经超过了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的意义还不仅限于其本身的作用,他们在研究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时,还发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如能结合社会资本,将可以更充分地发挥作用。^③

农民工进城后会出现分化现象,一部分人会回流农村,少数人可能会获得大的发展。白南生等指出,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的回流呈下降趋势,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虽然不乏回乡创业的生动案例,但调查结果并不支持“创业神话”;虽然很多外出者曾经有过回乡创业的梦想,事实上,绝大部分回流者回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之中,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回流地都适宜创业。数据显示,回流农户的平均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外出农户,与未外出农户不相上下;只要环境条件适合,一半以上的回流劳动力可能再次外出。作者还从再社会化的角度讨论了农民进城务工的行为和城市接纳他们的问题。^④

3. 农民工的多方面属性研究

孙立平指出,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两种“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叠加在一起,即在原有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之上,又加上了一种由市场因素造就的“城乡断裂”。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同时,又加上了一种“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

① 关信平等:《城市中外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状况实录——对成都和沈阳部分外来劳动者的调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6期。

②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③ 王奋宇等:《流动农民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4页。

④ 白南生等:《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页。

“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用人为主的制度因素将城乡分割开，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则是用经济等“自然”因素，使城乡“断裂”为两个世界。现在农民工的流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农民工的流动是发生在“两个时代”之间；第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不仅在户籍制度；第三，城市中另一个时代的再社会化造成农民工“回乡”之后的不适应；第四，城市越进步，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就越小。^①

一些学者的研究证明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很难的。李汉林指出，同质群体成员是构成农民工之间强关系纽带的基础；信任，尤其是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纽带关系强度的重要前提条件；纽带关系的强弱与农民工行为受影响的程度有关。通过证明这些假设，是为了进一步推导和证明我们的判断：在城里的农民工形成的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区域性的虚拟社区，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方式。总之，把关系强度看做农民工虚拟社区组织的一种特殊方式，一方面能够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社会过程以及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也能够使我们一步一步地触摸到农民工逐渐整合于城市社会的方式、步骤与过程，这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农民工这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是有益的。^② 翟学伟指出，中国农民一方面已经有了强烈的闯世界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处于弱信任建立不起来的背景之中。为了降低被骗的成本，他们只好固守在自己的强信任之中，从而在人口大迁移的背后，造就了中国都市里一支支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大军，出现了一个个“漂浮在城市中的村庄”的奇特景观。^③ 周大鸣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与本地人的研究，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新概念。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显示出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不同的两个系统，可称之为“二元社区”。二元社区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寄生

① 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47页。

② 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96页。

③ 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性”经济，二是“地方本位”政策。^①

农民工从其社会属性看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具有阶层流动性强、职业低质性、社会网络复制性、生活方式疏隔化等阶层特性。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佣人”阶层、“沉默”阶层、“无根”阶层和“边缘”阶层。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便成为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而市场与政府是冲击陈旧制度与过时政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②农民工进城后与城市居民的融合，是城市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民在与农民工的互动交往中，存在着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磨擦性互动，制度性歧视是主要的原因，但也有因农民工的活动条件与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引起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基于此，朱力指出逐步地削弱制度性歧视的政策，使农民工成为一个既有保护又有约束的社会群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③

李强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底层地位的表现：（1）次属劳动力市场的低价格；（2）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的非规范现象；（3）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关系网络之外；（4）农民工中数量颇多的非正规或违规职业者。^④针对农民工在城市受剥夺的情况，李强将那种既剥夺现在的劳动力、也剥夺未来的劳动力的现象，称作“多阶剥夺”或“剥夺链”。之所以提出“多阶剥夺”的问题，是探讨如何维护农民工的劳动能力，如何使农民工的劳动能力不至于受到过多的损失，以及关注农民工未来的养老问题，探讨现在的劳动力与将来的劳动力的关系。^⑤

李路路指出，流动人口已经进入城市居住，并且促使他们回到农村的可能性不大。有关中国城市化或者人口流动的既有政策，已经面临巨大调整的挑战：流动性移民一方面对所在城市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准备将自己作为一个很多人想要他们成为的“临时居住者”。因而，

① 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② 朱力：《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③ 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④ 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129～134页。

⑤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34页。

在主导的政策取向上,是继续严格的限制,还是转向更加积极的方面,是必须考虑的。最近,一些十分重要并且有益的转折已经开始出现,反映了政策主导取向的变化。^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变化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工人等城市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是新兴工人阶层与新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改善,但仍然没有走出二元化城乡壁垒,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宋林飞研究了农民工群体的“成长性”与“边缘性”。农民工群体具有成长性与边缘性的双重属性,其中,成长性是本质属性,是该群体生命力与经济社会功能的基础;边缘性是过渡属性,是目前以至今后一个时期仍然存在但将逐步消失的属性。应该加快农民工群体边缘性特征的过渡,进一步奠定农民工群体成长性特征的基础。^②

王春光指出,农民工是一个人口庞大的阶层、一个被身份遮蔽了的职业阶层、一个与乡村社会联系密切但又在逐渐与农业劳动者分离的阶层、一个在意识和行动上正在趋向阶层化的阶层。^③ 安徽省社科联课题组认为城市农民工的户籍在农村,但已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较大程度地融入了城市社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正在向工人阶级转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质属性和内部层级分化属性两个方面看,城市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已具备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属性。当前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和歧视行为、提高城市农民工的思想文化素质等方面,促进城市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深度转化。^④

朱力研究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不利于将农民工阶层的素质提升到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高度。^⑤ 大批的农民工进城,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准市民”阶层,他们

① 李路路:《向城市移民: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16页。

② 宋林飞:《“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③ 王春光:《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④ 安徽省社科联课题组:《城市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学术界》2003年第2期。

⑤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中的多数人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农民。制度障碍、土地牵制、交往局限、社会歧视等因素,使“准市民”难以与城市和市民融合。长期的不融合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影响城市化、现代化的进展。^①

二 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不得不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随时都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维护其合法权益,是我国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失地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就业岗位、住房房屋、生活保障以及集体资产等,特别是失去了维持农民生存、发展的低成本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却享受不到土地升值所带来的利益,失地失业又失去社会保障,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群。产生失地农民问题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其中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是主要原因。通过实证分析,廖晓军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提出必须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入手,才能顺利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确保现代化建设与土地用途农转非的协调发展。^③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以牺牲农民利益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思路和做法,令人担忧。实际上,失地农民问题暴露的是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缺乏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是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性原因。^④钱忠好、曲福田从理论上研究政府土地征用垄断的经济诱因,分析中国现行土地征用垄断制度安排下政府、农民、厂商利益受益或受损的状况,进而探讨中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有效约束机

① 朱力:《准市民的身份定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② 万朝林:《失地农民权益流失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6期。

③ 廖晓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④ 葛金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制,避免政府暴利潜能;打破政府土地征用垄断坚冰,允许非农建设用地入市等。^①

章光日等探讨了“被动城市化”的概念,这是指农民主观上不愿意被城市化或还没做好城市化的准备,但由于受各种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最终被融入城市的过程。^②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规模日渐庞大。他们进入城市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获得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过程。张海波、童星以自我认同为切入点,通过对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调查,发现他们的自我认同失调,即大部分失地农民尚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转换。主要原因在于失地农民是被动城市化的,“时间性”效应导致自我认同的转换滞后于物质的搬迁,“空间性”效应带来的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也阻碍了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基于此,他们提出了尚待进一步检验的一个命题,即“被动城市化”群体的自我认同,其社会参照系具有特定的“实践性”特征。^③张海波、童星还指出失地农民在经济上生存于城市边缘,社会交往兼具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大部分失地农民仍认为自己是农民,且认同适应不良,据此提出了改善就业、提高收入、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性建议。^④

卢海元指出,征地制度改革应充分考虑市场经济和征地对失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和“以民为本”的政策思想,确立“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以被征地所承载农民安置的实际社会成本为依据,制定征地补偿标准,制定适合失地农民特点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成果的内在机制,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和发展致富问题。^⑤

一些学者还进行了更为具体、细致的研究。田凯指出,从安置方式来

① 钱忠好、曲福田:《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反思与改革》,《中国土地科学》2004年第10期。

② 章光日、顾朝林:《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被动城市化研究》,《城市规划》2006年第5期。

③ 张海波、童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④ 张海波、童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卢海元:《土地换保障: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基本设想》,《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6期。

看,北京市农转居人员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农转工”人员;第二类是自谋职业人员;第三类是“转居非转工”人员;第四类是其他人员。针对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田凯提出应把农转居人员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①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课题组以“城中村”失地农民为对象,对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补偿安置、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管理、生活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基本概念和总体思路,以及加快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对策建议。^②

张汝立等分析了“农转工”、“农转居”和“农民工”这三种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农转工由于体制转型的问题而变得举步维艰,作为其替代办法的农转居虽然正成为许多地区解决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的首选方案,但许多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进城而面临着因其素质低下而无法就业只能“吃低保”的困境。因此,农转居不宜盲目扩大规模。与上述两种行政主导型的进城方式相比较,农民工则属于一种个体主导型的进城方式。因而只要加快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为其创造宽松的进城环境,则农民工无疑可以成为一种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吸纳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③张汝立还使用“再边缘化”理论的解释框架,主要通过对一个具体村庄的农转工从边缘化到再边缘化,以及安置这些农转工人员的单位的安置能力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解析,揭示出发生这种变化的体制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构具有更广泛意义的再边缘化理论。农转工人员进城存在一整套体制性吸纳的程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转工人员进城行为是主动的,其特征是主动边缘化;在体制转型中,农转工人员的进城行为由主动逐渐转变为被动或消极抵触,其特征为被动边缘化;体制改革本身所产生的体制性排斥力量使得农转工人员呈再边缘化的特征;农转工人员的个人资本影响其再边缘化的程度;农转工人员的再边缘化不仅对个人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对社会秩序产生很大的冲击。^④

① 田凯:《北京市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及其政策选择》,《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②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课题组:《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③ 张汝立、蓝宇蕴:《城市化与农民进城的方式》,《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

④ 张汝立:《农转工——失地农民的劳动与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三 关于进城农民和失地农民身份及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所有研究农民工和失地农民问题,都涉及“农民市民化”。陈映芳指出,“农民市民化”往往被视为“城市化”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取另一种视角,以城市社会学为基本范式,从探讨“农民”与“市民”的属性差异、市民化所涉及的人们生活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等问题入手,来解释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实质之所在,或许能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达到更深切的认识。^① 刘应杰指出,对于城市化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一个是宏观的角度,即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城市化;另一个是微观的角度,即从个人的角度研究个人的城市化。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个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要经历一个从农村人到城市人转化的过程,这就是个人的城市化。个人城市化是个人社会化的一种类型。个人的城市化是社会客观环境与个人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程度、社会参与度等因素对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②

陆学艺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流动机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农业劳动者向农民工流动的机制,如:①就业和收入压力机制,②年龄和性别机制,③人力资本机制,④社会资本机制。二是从农民工向其他阶层流动的机制,如:①制度机制,②年龄和性别机制,③经济机制。^③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堕距(lag of social mobility)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身份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②社会地位变迁落后于经济地位变迁;③职业的转变不能带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农民工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④公民权的变迁出现错位。^④ 陈映芳认为,作为中国社会中与“工人”、“农民”相并列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主要是将国家层面上的“公民权”问题转换成城市层面上的“市民权”问题,将“国民待遇”问题转换成“市民待

① 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② 刘应杰:《城市化的微观视角:个人的城市化》,《社会》1995年第5期。

③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30~332页。

④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35页。

遇”问题。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而目前中央政府的放责放权与地方/城市政府的自利自保倾向并不利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①

陆学艺指出，与城镇正式工人相比，农民工获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地位。^②王春光分析了农民工国民待遇的缺失主要表现在：①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和不公平；②教育与发展权利的缺位；③社会安全阀的残缺；④社会组织和意见表达权利的缺位。^③俞德鹏指出，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是一项既不公平又无效率的不合理制度，职业保留制度是等级身份制度的表现形式和核心内容，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与现代社会的法律精神相背离。废止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以后，应当不断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④

陆学艺还从阶级阶层分析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农民工问题表面上看是要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给予农民工应有的国民待遇等问题，而实质则是我们国家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维持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问题。农民工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⑤张友琴等对农民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政策分析，指出农民是城市化实践过程的重要主体，在城市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尊重其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防止仅仅把失地农民看做是政策的被动受众的倾向，以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对于城市化政策不仅必要而且具有重要性，发挥失地农民的主体性应体现在政策的起点、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政策的评估等各环节上。在政策实践中，可通过尊重农民的知情权、提高其政策参与度、改进农民与外界的沟通、保持

①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②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16页。

③ 王春光：《农民工的国民待遇与社会公正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④ 俞德鹏：《论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性》，《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11期。

⑤ 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7期。

政策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等环节,来培育、保障和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发挥。^①

王春光在分析农民工的尴尬和社会制度与利益刚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均衡全面改革、建构新型社会管理制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建议:第一,国家应从宪法和法律的层面,建立统一的国民待遇制度;第二,国家应将城市化确立为最基本的发展战略;第三,取消对农民工进入市场的制度壁垒和限制,建构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第四,国家要建立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体制。^②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含义;虽然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一样,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也没有确立一种社区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意识,但是调查表明,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不同的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试着(或者说努力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根据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状况,加快城乡社会结构变革,逐渐地满足通过外出务工经商离开农村的要求,在城镇社会留出一定的社会空间让他们立身落脚,改变他们长期“居无定所”的流动局面,使他们成为城镇社会新的居民,这才符合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③

四 社会网络分析及其在进城农民和失地农民研究中的运用

1. 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70年代快速发展并走向成熟,至今长盛不衰。如果说结构—功能主义统治了20世纪40~70年代的欧美社会学界,那么从70年代后期至今占据着欧美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主流地位的则是社会网络分析。这些年来,我国学者做了大量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引介工作。郑永强指出,社会网络分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关系性视角,从而为在操作层面上解决社会学中结构与行动的矛盾提供了机遇和办法。正是在这个意义

① 张友琴、李一君:《城市化政策与农民的主体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② 王春光:《农民工在流动中面临的社会体制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4期。

③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